

韩国现代 汉字研究

Hanguo xiandai
hanzi yanjiu

王平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68415

H552
01

韩国现代汉字研究

王 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北京



北航

C1675986

H552
01

0130684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现代汉字研究/王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021-6

I. ①韩… II. ①王… III. ①朝鲜语—汉字—
研究 IV. ①H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26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ÁNGUÓ XIÀNDÀI HÀNZÌ YANJIŪ

韩国现代汉字研究

王 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市 艺 辉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9021-6

2013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定价: 80.00元

前言

1. 研究缘起

在汉字文化圈内,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使用汉字的地区和国家还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中国大陆一样使用简体字之外,其他地区和国家使用的汉字并不完全相同。在信息化的时代,汉字的差异给信息交流带来不便,这就有必要研究汉字的共通化问题。研究汉字共通化,首先要尽快摸清汉字文化圈各国现行汉字的差异程度,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在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确定整理汉字的统一标准,制定各国都能接受的、符合汉字演变规律的科学方案^①。中日韩(CJK)各国的常用汉字表或教育用字表的颁布,均早于或平行于国际标准编码字符集 ISO/IEC 10646 的制定。在这些常用字表中,往往都没有汉字的国际标准代码^②。由于受技术条件和应用目的的限制,某些传统的汉字分析对比工作尚存在许多缺憾,仅以中韩汉字为例,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大量汉字范围内准确地描写出中韩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还没有准确地描绘出中韩汉字在字量、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的特征。至于对日韩汉字的编码状态、选字标准、认同关系、异体、正俗、简繁等对应关系,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信息方面的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对韩国现代汉字属性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中韩现代汉字比较研究缺乏可以操作的平台。如果以上问题不能解决,汉字软件的开发与应用、汉字文献资源的共享以及

① 冯志伟:http://www.hezi.net/Document/fengziwei/HanZi_standards.htm

②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中日韩常用汉字对比分析》,商务印书馆,2009年。

多元文化的交流等等都势必受其阻碍而无法顺利进行。

为解决数字化工作采用不同的汉字字符编码而引起的互不兼容、不能共享的问题,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都做出了积极努力^①,中国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②。韩国国际汉字振兴协会会长南广佑在2008年国际汉字讨论会上说:“在韩国和日本,汉字属于国字(国字的一种)。在韩中日三国,汉字是共同文字。汉字是韩中日三国文化的基础,韩中日利用共同常用汉字的字义即可进行交流,传达意见,在此过程中韩中日没有做出特别的努力。因此,韩中日需要把握这种有利的条件,提高其使用水平。”^③但是,由于韩国至今还没有公认的与中国现代汉语通用汉字7000字表相似的字表,所以,就目前来看,中国对韩国汉字研究的范围,仍然限于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1800字以内。从量形音义等方面全方位地对韩国现代用汉字进行的整理尚未取得深入进展,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准确描写出中韩通用汉字量形音义等特征的系统研究也还处于空白状态。

在数字化之前的汉字文献整理工作中,汉字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在汉字文献的数字化工作中,汉字却成为最令人困扰的关键性的问题^④。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搜索、统计以及类聚分析的准确性与便捷性。达到汉字文献数字化目标的关键是汉字的数字化处理,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关键是字量的统计与字表的制定,因为字量是标准字符集确定的前提。本书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材料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库技术,对韩国现代用汉字字量、字种、字形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统计调查与分析,所得结论与数据将作为CJK汉字统一编码的应用和补充,以促进汉字文化圈内统一汉字字形、统一汉字编码的实现,进而促成汉字在国际范

① 国际汉字振兴协会《国际汉字讨论会18年》,瑞原企业株式会社,2008年。

② <http://hanzi.unihan.com.cn/CoolHanzi/#K>

③ 南广佑《韩中日共同常用汉字选定案研究》,见《国际汉字讨论会18年》,国际汉字振兴协会,2008年。

④ Kang Sik Jin, Computerizing and applying Chinese character literature in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2009.

围内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2. 韩国现代汉字所指

我们以 1972 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这一时段为界点,将韩国汉字分为韩国历史汉字与韩国现代汉字。1972 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标志着韩国开始改变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此后出台的一系列汉字恢复政策,为学者们研究韩国现代汉字提供了素材。

本书所言韩国现代汉字主要是指 1972 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之后,韩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汉字字表中包含的汉字。例如:韩国教育部《汉文教育用基本汉字 1800》;韩国产业资源部技术标准院《交换信息用符号系统韩字和汉字 4888》(KSX1001 汉字 4888);韩国汉字考级机构用汉字考级字表;韩国人名地名用汉字字表。以上字表中的汉字,是目前韩国社会在不同场合下正在使用的汉字。

3. 韩国汉字研究现状

汉字约在公元前 3 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半岛。随后,约在一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记录地名和国名的汉字。而在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新罗时代,已经借用汉字来表示国名和官职名称。大约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朝鲜半岛不仅输入了汉字,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标记朝鲜语音。从高句丽时代起,中国的一些字书诸如《玉篇》、《字统》、《字林》等已经是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而统治阶层的汉字、汉文水平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汉字真正在朝鲜半岛民间普及开来是由于汉传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而后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通用汉字。直到朝鲜王朝世宗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文字不统一的标记方式,于 1446 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又被称为“谚文”。由此,朝鲜半岛虽然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官府的正式文书等仍旧使用汉语汉字。一直到十九世纪末,1895 年,李氏王朝进行了被称为“甲午更张”的改革,从那时起,其官方文书从专门使用汉字过渡到汉字与表音字结合使用,其后一段时期朝鲜半岛处于汉谚并用

的局面。在日本入侵期间,“训民正音”文字的地位迅速确立起来。1948年至1972年,汉字在韩国基本处于被禁用的时期。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一些表音字学者提出凡爱国者应全部使用表音字。1948年,韩国政府制定法律,规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条款允许汉字与表音字并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很多参战青年读不懂混有汉字的教科书,韩国政府便在军队中统一使用表音字。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字。然而历史影响并不能被轻易抹掉,汉字毕竟已在朝鲜半岛使用了近两千年,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韩国政府开始修改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并确定1800个“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1999年韩国的金大中总统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推动汉字并用方案》,规定在政府公文和交通标志上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近几年,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学习汉语热”在全球的演化,韩国年轻人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比例比之以往已有较大上升。但由于韩国政府多年来对汉字的忽视,韩国人学习汉字与汉语的能力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地区相比尚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所以,汉字问题已成为韩国不容忽视的问题。

韩国的汉字研究主要是从19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韩国汉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3.1 历史汉字研究

材料的整理是开展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的整理,主要集中在对韩国历史汉字资料的辑录、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韩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因此目前韩国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原则上说,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其实就是对韩国历史汉字材料的研究。韩国学者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

果。先有《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于1981年出版,著录韩国汉文典籍33808种。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于2005年出版,该书著录现存于韩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汉文典籍。另有一些韩国学者编纂了韩国现存古书综合目录,并调查了海外所存韩国古籍状况,如朴现圭的《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千惠凤等的《海外典藏文化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等。

从书写介质上看,汉字在中国汉末至19世纪末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段汉字的书写介质空前丰富,简牍、刻石、纸张等都已出现,依次充当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书写介质,呈现出由简牍向纸张过渡的趋势,最终以纸张代替其他书写介质而告终。同时,汉字在韩国传播使用时,亦在书写介质上有着与在中国相似的情形。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书写介质的不同,对不同书写介质的韩国历史汉字进行了辑录与释读。例如《新罗的文字》收录并释读朝鲜新罗时期的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李基白的《新罗上代古文书资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较为全面地收录自新罗到高丽王朝末年的许多古文书资料,而这些古文书资料有的是写在木简上的,有的则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部分古文书资料添加了释文与时代属性。与以上全面辑录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各种书写介质的著作不同,亦有不少学者对其中某一书写介质上的汉字资料进行辑录和解读。对金石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金锡夏的《丹阳真兴王赤城拓境碑解读文》(《史学志》1978年第12期)、南丰铉的《丹阳赤城碑解读试考》(《史学志》1978年第12期)、金煥泰的《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民族社1992年)、任昌淳《韩国金石集成》(一志社1984年)、金福顺《新罗石经研究》(《东国史学》2002年第37期)、金昌镐的《六世纪新罗金石文释读与分析》(庆北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对木简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李镕贤的《韩国古代木简研究》(高丽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朴仲焕的《韩国古代木简现状及其形态特征调查》(《鹿园杂集八》,2006年)等。

3.2 俗字和异体字研究

对韩国俗字和异体字的辑录与整理主要有以下成果值得关注:崔南善的《新字典》(大东印刷株式会社,1928年)附有俗字谱,可谓是对俗字关注最早的一部著作。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在搜集各种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韩国汉字的略字调查》(1991年)与《汉字略字调查》(1993年),收录包括《韵会玉篇》(1536年)在内的5种字典以及与《三国遗事》(1512年)相似的文献1种,另外还有包括《大慧普觉禅师书》(1512年)在内的与佛经有关的写本俗字资料。另有一些单篇文章也对韩国俗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研究。例如任昌淳的《韩国的印本与书体》(《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4集,(大邱)岭南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年)以坊刻本《大学》之俗字为研究对象,指出坊刻本保存丰富俗字材料的重要特征。柳铎一的《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韩国文献学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史,1989年)强调对坊刻本俗字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指出应对坊刻本俗字进行分类,并揭示其主要特征。河永三的《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中国语文学》第27辑,1996)对坊刻本《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中的部分俗字进行研究,并总结出坊刻本俗字具有的特征:简化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形声结构的兴盛、突出反映韩国之文化内涵、反映汉字所依托的独特载体等特征。对韩国异体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李圭甲的《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0年),该书对传入韩国的佛经中的异体字进行了整理与释义,其中辑录部分韩国俗字。

在对于韩国传统汉字材料和俗字材料的整理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虽然有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典籍进行整理,如李仙竹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黄建国等的《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等对中国所见部分韩国汉文典籍进行整理,但规模远远比不上韩国学者。另外,几乎没有中国学者专门整理韩国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对韩国历史汉字俗字进行整理的亦非常少,当前所见中国学者对韩国历史汉字俗字进行

过系统整理的仅有台湾学者金荣华。金荣华对韩国抄本俗字进行整理辑录成《韩国俗字谱》^①于1986年出版,该书对韩国的写本材料俗字进行了整理,编者根据33种韩国写本汉字材料,以《康熙字典》所录字为正字,于1712个韩国写本俗字单字之下分列俗字字样3780个。其他单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韩国俗字的,如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提到韩国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对照来写,但只是摘取部分俗字;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12月)亦举出一些韩国抄本俗字,但数量非常有限。

3.3 汉字书体研究

从书体上看,汉字经历了隶变、楷化等阶段,出现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各种书体,并最终形成了楷书为主、各书体兼备的局面。从记录方式上来看,汉字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手写为主,即使是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亦是以书写体为蓝本的。宋元以后,版刻书籍盛行流传,此时汉字的记录方式已经由手写转为版刻。从汉字形体来看,虽然这一段时期汉字从未走出异体层出不穷的局面,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汉字形体趋于整合定型的趋势。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与在中国相似的演变情况,对韩国历史汉字的书体进行了研究。如孙焕一的《新罗赤城碑书体 I、II》(《泰东古典研究》1999年第16期、2000年第17期)与《新罗时代书体研究》(檀国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两篇文章专门讨论朝鲜新罗时代的书体问题。

3.4 现代汉字教育研究

韩国现代汉字教育研究的内容包括基础汉字的选定、基础汉字字义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汉字书写指导等。韩国现代汉字教育研究的主体是

① 金荣华《韩国俗字谱》,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

80年代以来语学专业的研究生。从韩国国会图书馆学位论文目录索引可以查到以下信息:1980—2000年的20年间,研究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共82篇(80年代37篇,90年代45篇),但是这些论文大部分为韩语国文学科研究生所作,原因是汉字就是韩文的一部分,汉字词在韩国语词汇中占70%以上。在这20年间,真正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学位论文只有8篇,如赵国基《教育用基础汉字研究——以中高等学校教科书为中心》(1987年成均馆大学校教育大学院硕士论文)、沈庆昊《关于初等学校汉字教育的当为性研究》(1997年仁荷大学校硕士论文)、朴点玉《韩国和中国现行汉字比较》(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等。

2000年以来,面向教育的基础汉字研究成为韩国研究生的热门选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运用中日韩基础汉字比较研究方法。如金太汉《汉字文化圈内教育汉字比较研究》(2002年忠南大学硕士论文)、权善玉《韩中日常用汉字比较研究:以字数、字意为中心》(2002年庆熙大学硕士论文)、李允子《韩中日教育用常用汉字比较研究》(2002年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朴贞爱《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和中国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比较研究》(2005年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等。还有一些到中国留学的研究生也做了类似专题的研究,如朴点玉《韩国和中国现行汉字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把“教育用基础汉字”与中国《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相比较,得出中韩共同使用的汉字为1799个(韩语中的“𠂔”字属于韩国国字),对中韩两国现行汉字的字形、笔画数、笔顺、部首以及归部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

与韩国对于韩国汉字的研究成果相比,中国在对韩国历史汉字、俗字和异体字、历史汉字的书体以及韩国汉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张成、姚永铭的《〈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一期,总74期)指出《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的一些文字字形非常奇特,在分析字例的基础上,指出其文字字形一方面继承了汉字在中国的字形,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些异于中国本土汉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补充汉语汉字资料、探求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

重要意义。王华权的《〈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08 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的讹误、相混、相通等情况,继而分析该刻本用字的构形类型及特点,指出该刻本用字具有构形异化、无理据性等特点。王平的《韩国朝鲜时代〈训蒙字会〉与中国古代字书的传承关系考察》(大韩中国学会主编《中国学》第 32 辑,2009 年 3 月)首先将《训蒙字会》置于中国字书的行列之中,根据其成书于宋本《玉篇》之后、明代《字汇》之前的时代,指出其应与宋本《玉篇》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指出朝鲜时代教育用汉字具有字收常用、形从简化、义取通俗的特点。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录〉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提到韩国之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进行对照,指出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在字形方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 1 辑,2009 年 12 月)举出一些韩国抄本俗字具有异形、异构等特点,在分析相关俗字字例的基础上,得出《物名考》异形字具有字形丰富、主形与异形并存等特点。

在对韩国现代用汉字的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有限公司编写的《中日韩常用汉字对比分析》(商务印书馆 2009 年)、刘世刚《中、日、韩三国汉字一体化的初步设想》(1997 年)、裘锡圭《关于汉字文化圈内汉字字体统一案》(1996 年)等,以上论著侧重于汉字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书同文”问题研究。高银姝《韩国汉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分析》(2003 年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田博《汉字在韩国的传承与变异》(2007 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徐新伟《中韩汉字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选定了韩国现代用汉字中的某一部分,对其传承变异及使用情况做了分析。无疑,韩国及中国学者对韩国汉字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结以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韩国学者,对韩国现代汉字的使用情况关注不够。另外,由于受研究方法和材料的限制,往

往无法做到资料收集的穷尽性和研究层面的系统性。因此,对韩国现代汉字进行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尚属于空白。开展现代汉字的跨文化、跨语种的调查,包括对韩国现代汉字字量、字种、字形等汉字属性的统计调查和分析工作,及其传承和发展等情况的研究,是一项关系着汉字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内汉字资源共享的关键课题。

4. 本书的研究特点

数据库推动科学研究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证明,而在中韩通用汉字研究领域,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尚属空白。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韩通用汉字研究》课题组联合开发的《中韩通用汉字资料库》在国内外尚属首创。该库包括以下4个子库:《韩国汉字研究信息库》、《韩国现代用汉字数据库》、《中国通用汉字数据库》、《中韩通用汉字联合检索库》。《韩国汉字研究信息库》内容包括:韩国学者对朝鲜时代字书的研究资料和中国学者对韩国汉字研究的资料。有以下检索路径:论著题目、英文篇名、作者、作者单位、期刊、发表日期、类型、中文关键词、英文关键词、研究角度、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主要内容、参考文献等。《韩国现代用汉字数据库》内容包括:韩国 KSX1001 汉字 4888、韩国考级一级用汉字 3500、韩国教育用汉字 1800、韩国 8 家考级用汉字字表。有以下检索路径:字音、字义、字量、字种、字形、结构、构件、等级、共有项、独有项等。《中国通用汉字数据库》内容包括中国通用汉字 7000、常用汉字 3500 属性、HSK 汉字 2905。有以下检索路径:部首、笔画、字音、字义、字量、字种、字形、结构、构件、表词形式、表意功能、表音功能、对外等级、部首位置等。《中韩通用汉字联合检索库》以中国通用汉字 7000 为主表,在输入查询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对中韩通用汉字某一单字的任何属性进行联合检索和查询。《中韩通用汉字资料库》不仅为中韩汉字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平台,还为汉字文化圈汉字资源共享研究提供了丰富完整的资料。

本书基于《中韩通用汉字资料库》的支持,将韩国现代汉字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对系统内部的字量、字种、字形等汉字属性进行了量化统计与分

析。本书的结论与数据将对汉字传播国别特点、韩国汉字教学、汉字传播规律、面向计算机通用字符集的建设、汉字文化圈内汉字统一码、韩中汉字属性的对比描写、汉字断代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5. 本书的内容

基于《中韩通用汉字资料库》完成的《韩国现代用汉字研究》,分为四个研究板块:

第一,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研究。该部分通过对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的个案分析、对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的关系分析,指出 4888 字表是韩国现代用汉字的代表字表。4888 字表包括了韩国中等教育用 1800 个汉字,3500 字表中只有 13 个字没有包括在 4888 中,占 0.37%。4888 字表中有 268 个汉字有重码。3 张字表中有 5 个同一字形的字存在码位选择的差异,有 21 个字存在字形差异。以上数据为韩国现代用汉字的字量、字种、字形等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参考和资料。

第二,韩国现代考级用汉字研究。该部分内容包括:对韩国汉字考级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对韩国汉字考级用 3500 类、5000 类字表的统计和分析;对韩国 8 家汉字考级机构用汉字字表的字量、字种、字形的调查;韩国考级用汉字基本字的研制。目前韩国汉字考级的热潮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时期。但对韩国汉字考级用字的研究,尚缺乏系统、微观、定量调查和资料统计,这是韩国现代汉字研究的一个缺憾,应当引起中韩汉字学界的重视。字量、字种、字形等是汉字考级标准化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将韩国目前 8 家汉字考级机构公布的汉字字表建成数据库,通过对 8 家考级机构公布的考级汉字资料的整理,首次将这种源于考级字表的汉字资料与数据库字量、字种、字形、字频统计相结合,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研究结论指出,韩国 8 家考级机构所公布的汉字字表中有 4 家字表的字量与实际不符合。8 张字表的共有字种为 3382,这个数据可以成为韩国各汉字考级机制制定统一考级用汉字字表的基础标准。根据研究成果,我们从 3382 个共有字种中提取了 478 个基本字,该资料为汉字教材的编写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材料,在中韩

汉字教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第三,中韩通用汉字比较研究。该部分将中国通用汉字 7000 与韩国机用汉字 4888、韩国一级考级用汉字 3500、韩国教育用汉字 1800 的字量、字种、字形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指出:中国 7000 字与韩国 4888 的共有字量是 4387 个字。4387 个共有汉字中有 336 个字在字形上存在差异。字形差异情况归纳为以下几类:繁简、异体、新旧字形、古今字、正俗字等。指出韩国 4888 字有 233 个字未包含在中国 7000 字中。当前韩国汉字使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调整 4888 汉字字表,将中国的高频常用汉字而不见于 4888 字表的尽快补进。明确教育用汉字字形选定的标准、尽快制定出考级用汉字统一字表。

第四,韩国现代汉字的历史传承研究。韩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汉字文献,其中小学类资源相当丰富,可补中华本土所存历史文献之缺漏,或可作为极有意义的汉语文字研究的参照物,对于中国历史文献汇集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可以产生积极作用。从“洋为中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角度,研究韩国历史汉字。本部分从俗字、蒙学用字等不同的角度对韩国历史汉字进行了研究。俗字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的整个过程。对韩国俗字进行归类、考源、对比等研究,无论是对汉字传播史的研究,还是对韩国汉字传承变异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训蒙字会》是目前韩国现存最早的汉字教育用字书。研究指出《训蒙字会》所收字与中国古代字书具有密切的传承关系。韩国朝鲜时代教育用汉字之特点是字收常用、形从简化、义取通俗。

6. 本书的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域外汉学的发展是空前的。域外汉学的研究,最基本的层次是汉字及汉文化的传播。基于此,开展针对域外汉字传播历史过程的调研,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实践意义。

从学术价值来看,域外汉字的传播,奠定了海外汉学接受的基础。因此,对域外汉字传播接受规律的调研,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从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来看,高丽半岛的汉字文化,在所有域外汉字汉学传播过程当

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一环。汉字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传入韩国,到新罗统一三国时期(公元七世纪左右),汉字取得公用文字(或正式的、官方的文字)的地位。此后,虽然由于历史、政治、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汉字在韩语中的比例以及地位有所改变,但是一直得以传承和延续下来。从地域上看,在环太平洋地区“汉字文化圈”当中,韩国也属于最重要的“中转”区域。即使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其若干重要的汉籍文献,也是经由高丽半岛传入的。因此,开展中韩现代用汉字的来源流变调查研究,对韩国的汉字来源、传承、使用等方面进行调研,对于域外汉字研究,以及域外汉字教学、探讨域外汉字的传播、接受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通过韩国汉字文化保护和传播调查研究,还可以认识海外中国学的传播发展规律。

从实践意义来看,针对面向计算机的字符集创建,进行通用汉字范围内的全面比较,可以为国内的汉字研究提供帮助,同时本书对于汉字的推广和教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和传播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探究汉字形体跨文化流变,对两国之间文化交流信息交换和汉语学习的影响,从而探索海外汉字传播规律,由此为国际汉语推广服务,进而为“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同文”目标服务。调查中韩通用汉字的异同,为设计基于信息交换的字符集提供直接数据和资源;为面向韩语区的国际汉语推广提供汉字处理策略。有关通用汉字的对比调查结果可以为海外汉语教学提供服务,有可能为海外普遍存在的“汉字认知”这一瓶颈性制约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策略。有关通用汉字属性的对比描写,直接为通用字符集的建设提供支持。

总之,对中韩通用汉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整个汉字系统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汉字传播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扬光大都具有填空白、补缺环的意义。

本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韩通用汉字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740056)研究课题。

感谢韩国汉字研究所与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提供的资料支持,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协作态度和奉献精神。

目 录

第一章 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研究	1
第一节 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	1
1. 韩国现代用汉字的调查范围及相关术语	1
2. 韩国现代用三种汉字字表的个案分析	2
第二节 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的关系	6
1. 4888 字表与 3500 字表	6
2. 4888 字表与 1800 字表	7
3. 3500 字表与 1800 字表	8
第三节 研究结论	10
1. 4888 字表是韩国现代用汉字的代表字表	10
2. 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的覆盖率统计	10
3. 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存在的问题	11
4. 对韩国现代用汉字字表的调整建议	13
附表	16
1. 4888 字表中的 268 个变音异码汉字	16
2. 韩国现代用三种汉字字表的对比	21
第二章 韩国现代考级用汉字研究	67
第一节 韩国汉字能力检定考试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67
1. 韩国汉字考级的历史回顾	67
2. 韩国汉字考级的现状分析	72
3. 韩国汉字考级存在的问题	99
4. 韩国汉字考级的改善方案	103
第二节 韩国汉字考级用 3500 类字表的统计和分析	104